



【名家背影】

## 鲁迅研究的一面旗帜 ——怀念王富仁先生

文人之间的相识往往是从文章开始的。

1980年10月前后,《文学评论》的实际主持人王信同志来到《鲁迅研究》编辑部的木板屋里,向我推荐说:“西北大学有一个叫王富仁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尤其是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小说的比较研究,连写了好几篇论文,篇篇有所突破,‘文评’已经发了两篇,不好再发,你们《鲁迅研究》能否考虑?”我连忙跟他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去,挑中了一篇与安特莱夫比较的文章。回去一读,被惊住了。深入细致,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确实新颖别致,堪称妙文。我立即写了初审意见,交给林非先生。他也觉得很好,批准发表。这样,王富仁这个名字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了。

和富仁见面,是在四年之后,文学研究所搬进新盖成的社科大楼时。那会儿,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博士论文的第一阶段成果《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已经在《文学评论》隆重推出,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想,他一定衣冠楚楚、十分文雅。及至一见,才发现他朴素得像一个乡村教师,面容显出倦意,看来是极度用功,经常熬夜造成的。

林非先生一见他就非常喜欢,一离开就对我说:“要是能把王富仁要到咱们研究室就好了!”我也百分之百赞同。

但是人才是哪里都抢的。富仁提前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之后,经过甘当人梯的杨占升老师多方努力,留在北师大了。我们只得甘叹“遗珠”。不久,听到北师大传来消息:王富仁讲课得极好!极受欢迎!一上课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这时,富仁也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嫉妒与反对,给他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书挑刺儿,“求全责备”,提出种种苛刻的意见,但富仁不为所动,毅然反驳。经过时间的洗礼,日益看出王富仁及其著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我认为,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书

2017年5月2日晚,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他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李何林先生门下读博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王富仁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小说。这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

——编者

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鲁迅研究领域,而是新时期当代中国精神解放运动的一个标志——让思想冲破牢笼,跳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固定模式,从大观的角度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开始新的思想历程。有人说王富仁在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之外影响有限,就断言他不是大家,这是一种短视。其实,看一位学者是否大家,不能仅着眼于著作的数量和技术性的考证、阐释,而应着重其思想影响的深刻性和精神传播的广泛性。从这个视域出发,王富仁毫无愧色地站在大家之列。特别是“反封建思想革命”一点,不仅当时具有巨大意义,就是当今以至很远的一个时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富仁有此成就,足以不朽,但他没有止步,到汕头大学任终身教授之后,又开始了“新国学”的创立。我认为其意义超越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提法,而是将五四的新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为一,给国人引导出

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有识者言:国学倘无五四精神为内核,可能是历史的倒退。切中肯綮!可惜,至今人们仍然未能真正认识其中意义。又因为富仁先生的病与死使之中断,不禁令人仰天长叹,深为遗憾!

要坚持五四精神,就须坚守鲁迅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富仁先生是众所公认的旗帜和“死士”。

他在《说说我自己》中讲过自己的性格:“大多数的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撞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也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大声呼吁:“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最高点,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鲁迅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既来自外部,也应来自我们内部,所以说我们不要埋怨外部世界,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也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又疾呼道:“谁骂鲁迅,我就骂谁!”

当然不必用“骂”字,要用扎实、令人信服的史实和理论说话。“骂”字不过表现了富仁先生性格的耿介,实际上他正是以史实和理论服人,无可辩驳地使人们认识到:中国需要鲁迅!毫不夸张地说,富仁先生是捍卫鲁迅的团队中史实最扎实、理论最雄辩的一位!

富仁先生的性格与学识都决定了他一直到死都毫不动摇地学习、研究、维护鲁迅,成为鲁迅研究领域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与可歌可泣的“死士”!

富仁先生的逝世使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一面旗帜和“死士”,但我坚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战士以他为榜样,在一片微红的新月升起的西天角涌现!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生随想】

## 美哉淮扬菜,伟哉周公仆

□万伯翱

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山东、河南的北方汉子,吃惯了山东的煎饼、鸡蛋卷大葱,喝惯了河南的黑乎乎的胡辣汤和大海碗羊肉烩面,怎么今天一下子就爱上精巧的淮扬菜了呢?

淮安市被人称为“漂浮在水上的美丽城市”,这次受邀参加首都作家诗人采风团,第一次亲临此地看到了她的风采,确实名不虚传。她是一座大小河水环绕的名城。中国的“四大名菜”“八大名菜”或“十大名菜”,除了淮扬菜外,都是以省份名开头的,如排在前三名的川、鲁、粤菜,唯独排列第四名的淮扬菜是以省以下城市命名的,是淮安、扬州和镇江三个地级城市的总称。淮扬菜系应以著名的扬州菜为核心代表,而我家乡的鲁菜是以孔子故乡曲阜的孔府风味代表整个齐鲁大地。美食家早已把淮扬菜和鲁菜并称为国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毛、周两位开国伟人以淮扬菜为主定为“开国第一宴”。如果你真有兴趣,当年的菜谱还在,而且如果你提前预订,还可以在北京饭店品尝一番“开国第一宴”的全部美味佳肴呢!

淮安在历史上是由京杭大运河、古黄河、盐河和淮沭新河穿城及五大湖之一的洪泽湖等湖蜿蜒流经而形成的,是当年水上黄金时代的总指挥部。这里记载着丰富无比的运河和漕运文化。历史上这里呈现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十分繁荣的景象,是我国著名的集南北粮、盐、商品货物等的集散基地,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运河之都”等等美誉。所以,淮安的文化、经济、语言以及食文化,大有南北并蓄、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特征。我们这个由诗人、作家组成的采风团,到了这里的正式宴会或大小饭馆,北方作家都惊奇地发现:我们北方人喜用的面食如饺子、包子、面条等却在淮扬屡屡显身手,无论色味香都不亚于北方的面食功夫,精细无比的“淮点三绝”的饺子皮更令人惊叹,竟能一斤面擀出800张薄如蝉翼的面皮!并且包出的饺子个个不渗出水和油,据说透明度可观看报纸,还可点火即燃。这大概和北方面点师一斤面拉出千丝万缕细如发丝的面条且不断不粘连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当我再品尝到香而不腻的清汤狮子头,咬开用手工打成泥的微现粉红的鲜肉,细碎的马蹄入口时,感觉清香脆甜,此佳肴只有中华食文化中的淮扬菜才有呀!

我脑海中即浮现出上世纪60年代开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几次招待宾客,如招待我的朋友、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和邱钟惠率领的国家乒乓球队全体运动员、教练员时,宴席上的“四菜一汤”中,就有总理钟爱的他家乡的这种“清炖蟹粉狮子头”。敬爱的总理都是自掏腰包宴请这些国手的,还特别强调:“我请客,但粮票你们诸位还都得交啊,我是总理也不能搞特殊呀!”庄、邱两位冠军和之后的国乒总教练张燮林都告诉过我,总理是用狮子头、番茄肉片、平桥豆腐和青菜炒香菇这四个菜外加萝卜丝鲫鱼汤招待这些在国际上争得荣誉的乒乓健儿的,主食是米饭加馒头。总理请夫人拿出他家中珍藏多年的茅台,与他都能叫出名字的国家乒乓球队队员和教练员碰杯。饭后周总理还主动“叫板”,和小邱、小庄在西花厅走廊里用伤残的右手记分杀满了两局21分球赛呢!总理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乒乓球刚传入我国不久,年少的他热爱的课外活动除了演现代文明戏(话剧),就是打打乒乓球。他和世界双打冠军郑敏之、林慧卿等也交锋对阵过。

周总理和邓妈妈没有子女、没有房产、没有金银,也没有任何存款,他就是这样一位清廉的人民好总理。他1976年元月去世,嘱咐把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此刻,故居的解说员仍激情不减地对我们说: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甚至二十四小时,还有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文革”中,他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一次他下车走进西花厅家里时,竟站不住了,双腿一软,眼前一黑,倒在了卫士和秘书身上,他们将他连背带抬进了屋里。他默默承担着浩繁的工作、委屈而又违心的检查,使他如残伤老牛负重。在他心里没有自己,唯有祖国和人民,他最后十年在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像章,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是中国人民的公仆。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